《清史编年》第一卷读后

任　铭

史松、林铁钧同志编写的《清史编年》第一卷，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清史研究所“清史编年”研究室计划编写的十卷本《清史编年》的首卷。近年来，清史研究的成果相当可观，除了大量的论文之外，陆续出版了不少专著，而作为有关清代史事的编年体著作，解放以来这是第一本，因此，它的出版必将受到人们的关注。

本卷起顺治元年（1644）迄顺治十八年（1661），都四十八万余言。关于本书的性质，作者在出版说明里指出：“《清史编年》，顾名思义，就是采用编年体裁，自清朝入关时起，对清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对外关系以及人民群众的起义斗争、著名历史人物的活动和重大自然现象等方面，按时间顺序予以综合编纂的清代史料长编”。编年体史书在我国源远流长，在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除了象《春秋》、《资治通鉴》等不朽名著之外，历代正史中的本纪，实际上也就是各该朝代的简要编年史。就清朝来说，历朝实录、《东华录》也都是清代编年史。编年体史书的优缺点，历来论述已多，它的突出优点，在于按时间顺序排列各该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使人们易于了解历史事件发展的线索以及各个事件之间的联系。一部好的编年体史书，应该是取舍得当，详略适宜，考订精详，编排合理，文字简炼。用这几点作为标准来衡量本书，可能还有些值得商榷之处，但总体看来，仍不失为是一部好的编年体著作。

取舍是否得当，这是编年体史书首先碰到的难题。历史是一个日夜演出的午台，每时每刻都有众多人物在活动，都有或大或小的事件发生，在这纷繁杂乱的状态中，何者宜于编入，何者可以舍去，过严则失之简略，过宽则易流于杂乱。本卷涉及的年代，正是清朝入关之初，清朝、南明，农民军余部几大势力之间，纵横捭阖，天下纷纭的时代，顺治一朝十八年的历史，基本上就是清王朝先后击败各个反对势力、建立全国统治的历史，这就决定了本书必然以政治斗争为主要线索。在史事编排上，在清朝、南明、农民军余部三者之间，以清朝作为主体，把坐标移到清王朝这方面来，对于清王朝的军事政治活动、各项政策措施、内部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和斗争，都用较大的篇幅给予较多的叙述，而南明内部、农民军余部内部的综错复杂的关系，凡于抗清关系不大者则略而不书，或书之从简，有取有舍，删除繁杂而又大事不漏，使得本书脉络清楚。

满族贵族以少数民族君临天下，顺治一朝发生过许多用非常手段，残暴屠辱汉族人民和知识分子的事件。这对于口口声声“勤政爱民”的清朝统治者来说，是不愿见之史书流于后世的，《清实录》、《东华录》等书，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对于清朝的稗政，或者根本不谈，或者着意粉饰，掩盖了历史的真实。作者们花了很大力气，把许多被歪曲被掩盖的历史

事实加以澄清，如顺治十四年的“科场案”，顺治十六年的“通海案”，顺治十八年的“哭庙案”、“奏销案”、“明史案”都是发生在江南地区而对全国产生重大政治影响的大案，这几个案子的镇压对象主要是江南的知识分子阶层，或则加以屠戮（科场案、“通海”案、哭庙案、明史案），消灭人身；或则加以斥革，剥夺了他们在政治上向上发展的权利，连续几年间发生的政治事件，是清朝政府有计划的镇压行动，江南数称人文渊薮，广大知识分子从明代中叶起就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议论朝政，臧否人物，会盟结社，影响当局，俨然政治舞台上的一支力量。及至清兵南下，明朝灭亡之后，许多人同人民群众一起抗击清军，成仁取义，至死不悔。又经过了十几年，斗换星移，人事已非，而当郑成功攻入长江，进至江宁，大江上下云起响应，这在清朝政府看来当然是非教训不可的。上述几个事件，只是清朝政府实施这个方针的口实，株连之广，杀辱之惨，大大超过了常理。奏销一案，斥革者一万三千余人，有“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哭庙一案，罗织罪状，处死金圣叹等十八人。清王朝想以非常手段，摧折民心士气，但手段实在恶劣狠毒，有玷“圣德”。本书以较大篇幅，简洁的文字，将这几个案子的来龙去脉清楚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足见编者用力之勤。

作为一部“史料长编”，提供给读者的应该是经过爬梳、辨正的史实，也就是说，编入书中的历史事件，应该是忠实可靠的。读完本书，可以看出，作者们在这方面也是下了不少功夫的。顺治一朝的历史事件，说法歧异者甚多。一般来说，历史上的记载往往如此，但顺治一朝更甚。这也难怪，政治上的纷争必然带来记载上的矛盾歧异。因此，即使一个具体日期的考定，也是相当繁难的工作。辑入本书的历史事实，一般都经过了比较研究和判别，言之有据，因而也是可信的。编者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件事，如南明鲁王朱以海监国日期（页87）、张献忠阵亡日期（页139）、郑成功顺治十三年揭阳之败时间（页446）、刘文秀病死时间（页510）、缅人杀永历从官日期（页609）、吴三桂杀桂王朱由榔日期（页619）等等，旁征博引，经过比较研究，然后加以判断。限于体例，编者并没有充分论述做出那样判断的理由，当然也不能说都是定论，但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编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对一些根据不足的事件，则采取诸论并存的处理方法，同样表现了编者的谨慎。

上述只是就其主要的方面而言，并不是本书已是十全十美了。相反，本书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般地说大事不漏，但也有个别遗漏的，如顺治五年十一月加多尔衮皇父摄政王称号这一重要史实就被疏忽了，类似的恐怕还有一些；个别例行公事式的活动似乎也可从省；在史实的考订方面，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减少存疑之处，以帮助读者澄清疑而难决的事实；经济特别是文化方面的记载略嫌欠缺，编年体史书这种体裁对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反映本来就有很大的局限性，对此固然不能苛求，但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对后代有影响的文学家、艺术家反映的确少了些。此外，在利用史料方面，档案和文集使用较少。顺治朝档案数量不太多，应该尽量利用，文集中所保存的大量史料，不仅可以有助于澄清史实，还可以使我们对一些重要历史人物有更深入的了解。

采取编年体裁编集一代史事，是一件极其繁难艰巨的工作，但也是一件极有意义的工作。它来不得半点花架子，需扎扎实实，为研究清史或对清史有兴趣的各方面读者提供经过整理鉴别的、系统的基本历史事实，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所以尽管有一些不足，但本书的出版仍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我们热切希望能在较短时间内，看到本书的第二卷、第三卷以至全书陆续问世。